二战后新加坡华族会馆的变迁、原因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李金萍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 新加坡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华族会馆,在二战结束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包括战后初期的短暂恢复、新加坡独立后的低潮以及 80 年代以来的复兴。新加坡华族会馆的未来发展道路要以新加坡为中心,以继承和传扬中国文化为根基、以承接新移民为发展方向,并在华商网络构建的过程中逐渐国际化,以此来开创新加坡华族会馆发展的新局面。

关键词: 华族会馆; 宗乡; 华人; 移民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4)03—0102—06

DOI:10.13848/j.cnki.dnynybjb.2014.03.017

新加坡接收中国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1838 和 1839 年,共有 2069 名中国人移民至此……1890 年增至 95400 人,随后在 1985 年突破 100000 大关,来自中国的移民数量达到 190901 人。"[1](P33) 二战期间,华人移民进程中止,之后,华人又重新开始移民新加坡,所以华人在新加坡的人口数量并没有因此减少。"1947 年,自然增长成为人口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土生华人比例的巨大增加。"[1](P48) 在近一个世纪的移民和发展过程中,新加坡的华人纷纷建立了以方言区为划分标准的"帮",兴建庙宇,并逐渐形成包括以血缘、地缘及业缘为基础的宗亲、宗乡社团在内的华族会馆。自 1819 年新加坡第一间会馆曹家馆建立以来,宗乡社团和宗亲社团已成为华人的传统组织。二战以来,新加坡华族会馆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

一、二战后新加坡华族会馆的发展概况

二战后至今,新加坡华族会馆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其生存和发展概况大致可以分为恢复、危机与复兴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战结束到新加坡独立之前,宗乡社团和宗亲社团从日据期间的停滞状态逐渐进入战后的恢复与转型阶段。在数量上,华族会馆显示出逐渐恢复和稳步提升的趋势。尽管华人移民潮的步履放缓,但新加坡地区华人的数量仍在不断增长。"马来亚 1947 年的人口普查表明,作为殖民地的新加坡地区……与 1931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相较,人口的增加超过了 65%……更确切地说,在大约 940000 人中有 729000 人是华人"。[2](P59) 到 1957 年,新加坡华人人口 109 万余人,占总人口的 75.4%。[3](P29) 稳固的华人数量基础为会馆的组建提供了一定的需求和动力。1945 到 1959 年间,新设立的地缘性社团 45 间,血缘性社团 93 间。[4](P49) 在此基础上,会馆的作用也得到较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帮助解决因受战争影响、百废待兴的新加坡社会产生的各种民生问题。例如,面对华人子女的上学问题,福建会馆在 1945 ~ 1946 年两年间,就复办了道南学校、爱同学堂和崇福女校三所华校,并分别于 1947 年和 1953 年创建了南侨女中和光华女校。除了在数量和功能上逐渐恢复之外,还产生了初步的转型倾向。"战后初期,东南亚华侨的宗乡会馆和宗亲会馆几乎都卷入了中国国内的政治,

收稿日期: 2014 - 7 - 30

作者简介: 李金萍(1989 ~),女,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2013 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从而引发了两派之间对领导权的激烈争夺。然而，随着它们的成员逐渐认同于居住国以后，这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斗争也就渐告平息。广大华人面临的问题是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和文化传统，在这一背景下，亲情乡谊便自然成为团结华人的一种精神力量。”[5](P209) 可见，宗乡社团较为自然地随着新加坡从自治走向独立而发生转型，表现为逐渐淡化自己的政治色彩并将关注点从中国转向新加坡。例如，福建会馆在1950年由陈六使出任主席之后，“福建会馆政治功能的指向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至其后期，会馆的政治性功能则趋于消失，最终完全被文化—教育性功能所取代。”[6](P201) 由于会馆的活动重点和功能发生转移，其性质也从中国本位日益向本土化倾斜，逐渐成为服务于当地的华人社团。

第二阶段是从新加坡独立到70年代末，新加坡的宗亲会馆和宗乡会馆进入到发展的低潮和危机阶段。“新加坡自1960年以来新登记的血缘地缘组织的数量一直在减少，1978年到1984年间再也没有新会馆登记”。[7](P12) 在这一时期，会馆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都面临着危机。首先，在新加坡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许多会馆用地都被征用。1970年丰永大公会被政府征用该会的义坟山，赔偿后于1980年才择地重建。兴宁同乡会受市政建设的影响，会所被政府征用，1983年才因众人鼎力资助购得新馆址。三和会馆、惠州会馆也分别于1976年和1985年被政府征用。[8](P204~206) 这对会馆的日常活动难免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次，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会馆的需求有所减少。与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的局面不同，新加坡经济的稳步发展使得居民生活水平与战前相较有较大改观。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导致华人对传统华人组织的社会福利功能依赖的衰减。[9](P368) 新加坡自治、独立时失业率分别是10%、8%。70年代初，失业问题即获解决。经济成功还使得建屋计划成功，70年代基本解决了住房问题。[10](P47) 此时，作为帮助解决华人生活困境的宗乡社团既失去了国内的一部分群众基础，又面临华人移民潮的消退，使得会馆的存续基础逐渐衰减。此外，新加坡独立以来，政府着重培养华人对于当地的认同，形成“新加坡意识”，这使得以情感纽带为生存根基的会馆受到了致命的冲击。大量的群众性文学、艺术、音乐、体育、文化类新型社团的出现，吸引了第二、三代华侨的加入，与传统的宗乡、宗亲会馆形成了一定的竞争。

第三阶段自80年代初至今，是华族会馆的再生和复兴阶段。新加坡独立后的十余年间，会馆在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之下似乎陷入了发展的泥沼。众多会馆在随着华文、华校、传统文化的消退而即将在人们的视线中被政府、社会机构所替代时，会馆重生的契机产生了。1984年12月2日，新加坡的九大会馆（福建会馆、潮州会馆、广东会馆、南洋客属总会、琼州会馆、三江会馆、晋江会馆、惠安会馆和福州会馆）举办了“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集体讨论会馆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研讨会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决定成立一个能够代表全国宗乡会馆的组织——“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这意味着，华族会馆在政府的指引下，找到了自己发展的一席之地。各大会馆既能利用总会这个平台与其他会馆沟通交流、相互协调，又能通过总会构建一个华人与政府的双向通道，使得华人的诉求得以表达。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成立使得华人宗乡团体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二战以来影响新加坡华族会馆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

导致二战后华族会馆发展起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因素分别是华人认同的转向、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多元族群和谐政策的推行。

（一）华人认同是影响新加坡华族会馆发展的内在和基础性因素

19世纪初，中国移民远赴东南亚寻求出路，其故土情感、文化意识和生存困境是会馆产生的直接推动力。会馆围绕华人的利益设立宗旨，而功能则以举办各种抒发故土情怀、继承与崇扬传统文化的活动得以发挥。显然，华人是会馆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与动力。换言之，在众多影响会馆发展的因素中，华人必然是决定性的，而华人认同又是衡量华人观念及行动转变的重要因素。因此，影响会馆发展的所有因素都是通过推动华人认同的转变而起作用。在二战之前，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是指向中国的。“他们关怀祖国的存亡绝续、荣枯兴衰，并愿意为祖国献身。这种归属的认同感，是心理与感情的融合，使自己与祖国成为浑然一体，不分彼此。”[11](P21) 相应地，宗乡社团和宗亲社团华侨同胞的爱国爱乡的情怀相继建立，在帮助料理丧葬、排解纠纷、济贫救困、资助华文教育、维护侨民的群体利益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移势变，为了生存与发展，华人的国家认同，不得不跟着转向。”[11](P7) 战后的新加坡经历了取得自治地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以及成为独立国家等重要政治历程，华人的政治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新加坡政府各类政策的推动下，华人的“落地生根”意识逐渐代替了战前的“落叶归根”思想。“领导着包含宗族会馆和行会在内的传统社会组织的华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领袖……开始遭遇在新加坡华人中的影响力的减退。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土生华人的年轻一代将新加坡定位为家乡。新加坡的独立和福祉对他们的生活至关重要。”[9](P192) 相应地，这一时期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会馆经过了战后的短暂活跃之后，随着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乡谊的纽带作用日渐微弱，社团发展程度大不如前。然而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力量成为新加坡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难以忽视的因素，会馆在政府的帮助下重新唤起埋藏在华人心底对中国的文化认同，迎来了重生与复兴。总之，以维护华人利益为主要的存续基础和发展目的的会馆，其发展的起落必然与华人认同的转变有紧密的联系。其他因素则通过对华人认同的影响，不断推动会馆的调整与转型。

（二）二战后国际形势下的华人处境是新加坡华族会馆转变的外部动力

二战后冷战局面的形成，给东南亚的区域形势和该地区的华人处境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敌视和排挤愈演愈烈，东南亚的广大华侨华人在“第五纵队”的假想之下成为众矢之的。“由于冷战系统的关系，许多东南亚的新兴国家在美、英等国的影响之下，无法在对华关系上有突破性的评估。”[12](P217) 表现为在冷战意识下对国内的华侨普遍采取限制和排斥的政策，加上东南亚地区新兴的民族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等国急于建构民族认同而对华人采取强硬的同化政策，致使东南亚地区华人的处境迅速恶化。新加坡置身于东南亚的大环境中，也难以避免地受到影响。“在60、70年代，新加坡政府一直有意在国内淡化华人意识，淡化华人文化，淡化华人社团的作用。”[13](P153) 此外，面临生存的挑战和发展的需求，新加坡华人的态度也出现转变，不得不面临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东南亚新兴国家的出现，还使得二战前并不存在的国籍问题变得突出和尖锐化。[12](P219) 在与东南亚的新兴民族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和尊重华侨华人的长期利益的前提下，中国的态度从积极支持华侨回国参政、动员华侨协助祖国建设，逐渐转变为鼓励华侨融入当地。废除双重国籍政策对华人认同的转变起到直接推动的作用。此外，为了扭转华人的不利处境，维护华人的合法利益，1957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使出生于中国的华侨能够获得新加坡的公民权，曾经向英国当局多次提出交涉。在众多华人社团的响应和支持下，最终达成了在必须放弃外国国籍的条件下，在新加坡居住8年以上者可以归化为新加坡公民的方案。“这样，出生于中国的20多万新加坡居民终于得以申请归化为新加坡公民。”[13](P143~153) 公民权的获得使得大多数华人已经初步认同于当地，使得以华人为基础的华族会馆受到冲击。“新加坡的自治独立，恰恰成为新加坡华人传统社团组织发展中一个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期。”[14](P153) 冷战结束后，随着东盟和中国政治关系的缓和以及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华人处境有所改善。“80年代，东盟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对华族资源的利用，势在必行。因此，进入90年代，当有关国家继续其经济建设活动、信心亦大为增加时，对华族资源的重视是会大为增加的。”[12](P278) 此时，鉴于新加坡华人经济和文化影响的日益提升，华族会馆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伴随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建立以及华人对于新加坡认同的日益加深，华族会馆逐渐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在新加坡社会中寻求自身定位，围绕新加坡的发展开展活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多元族群和谐政策是推动新加坡华族会馆变革的直接因素

新加坡独立以来，政府为了促进新加坡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以及促进各族群和谐相处，实行了多元族群和谐政策。即“政府在承认国家是多元族群、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基础上，平等对待国内各族群，提倡各族群相互接近，促进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相互容纳，最终形成一种既包容国内各民族的文化，又为各民族所认同的国民文化”。[15](P43) 该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推行新的社团管理制度、教育政策和社区建设等。华族会馆的跌宕起伏则受到相关政策的直接影响。

首先，促进多元族群和谐的社团管理制度直接促使华族会馆的变革。“有人认为传统组织，比如会馆，宗族组织和行业协会具有区分的作用，不利于在新加坡构造共同的国家认同。因此在1969年，政府禁止这类（以种族为界限的）组织的成立。”[9](P272) 并且要求已经成立的传统社会组织进行自我改造和更新，以加快新加坡认同的形成。此外，政府还采取各种手段以削弱华人社团的影响力。例如，“政府不再从传统帮派社团首领中挑选高层管理人才，政府高层官员也大都不加入传统宗乡会馆的活动。”[13](P153) 加上许多会址因城市重建而被征用，导致华族会馆在新加坡的社会改造和国家建设过程中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然而进入80年代中期，政府一改往日态度，对会馆明确表示关心和支持，并直接促成了宗乡总会的建立以帮助华族会馆在新时期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新的语言和教育政策直接关系到华族会馆的发展。战后初期，压抑已久的华族会馆和华文教育出现了短暂的复兴。近17所会馆耗费大量财力、物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力，领导和参与了约 20 余所华校的复办与重建。[16](P42) 然而，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二年，政府开始正式推行双语教育体制，并且英语的地位逐渐提升，成为了新加坡各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华文教育的衰落不仅导致了作为会馆重要工作点的华校面临改建、收归国有和停办，而且还影响到了以语言为传递媒介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青年人中的继承和发展。然而，随着双语政策的弊端逐渐显露，社会面临着缺乏民族文化、年轻一代大多接受西方观念的困境，华语重新被重视起来。新加坡通过设立特选学校制度、开展讲华语运动和华文教学改革等措施，调整了双语政策。而会馆作为在文化教育方面曾做出突出贡献的华人社团，在政府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下，发挥其传承中国文化的优势，配合国家的教育政策，改变西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树立了新加坡价值观，华族会馆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可见，教育政策的推行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华族会馆的衰落与兴盛。

此外，为了加强国家建设，促进社会转型以及改善各族群间关系，新加坡采取了由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新加坡政府自 1960 年开始实行组屋政策，通过对社区的重组，诱使方言和种族群体在新的住宅区实现混合。”[17](P19) 族群聚居的边界被打破使得会馆的地盘和优势逐渐消退，“传统华人开始接触多样的人群，亲属关系（尤其是在传统华人组织中表现出的远距离的血统联系）的重要性大幅缩小。”[9](P327) 另外，政府还构建了完整的社区管理体制及组织体系。其中，民众联络所、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社区基层组织的设立，构建起新的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和社会网络，并且“发展一种社区意识以取代旧社团的乡情与族情，举办旧社团所能提供的社会福利事业，举办地方成人教育，幼儿教育，老人院，并开展文娱、体育、青年、妇女等活动。在财力、场地、人力、干部、活动和政治出路等方面，旧社团都难以和它们相比。”[10](P48) 因此，新加坡社区建设及相关组织的建立瓦解了华族会馆生存的空间结构并代替其发挥社会功能，取代了殖民地时期传统会馆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三、新加坡华族会馆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当前，华族会馆不仅承载着传扬中华文化的使命，还要将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和新移民涌入等各种因素融入到未来发展的全过程，并且要在逐渐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促进新加坡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的蓬勃发展。

（一）以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

新加坡华族会馆自建立到发展至今一直担任着传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角色。殖民时代的文化功能主要出于大批背井离乡的移民对故土文化的眷恋，而如今更多的是由于新加坡政府对保留东方传统价值的提倡以及对华语经济价值的利用，从而对现今华人的华族传统文化进行有意识的培养。新加坡建国后，“由于偏重和强调英文，以及英文的广泛运用，导致新加坡迅速西化，年轻一代华人淡化甚至抛弃中华文化，转而接受西方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颓废文化。”[18](P108) 为了弥补全然承接西方文明对新加坡带来的消极影响，新加坡政府开始重视华人传统文化，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除了推行儒家伦理课程外，华语运动也于 1979 年在全社会推广。作为华人文化集中和发展阵地的宗乡社团，对于文化的传扬和华语的推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就自然承接起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地通过多种方式履行着传扬华族文化的责任：推广华族节日，保留传统价值观；推广表演艺术，提高欣赏水平；通过比赛与文化活动，发扬中华文化；保存文史资料，传承文化传统；重视华文教育；通过学术交流活动，发展高层次文化；筹建会所；促进会员交流，发挥领导作用；打响总会招牌，推动会务发展等。[19](P22～27) 可见，在提倡中华传统价值观和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华族会馆的角色至关重要。会馆应抓住新加坡政府建立“新加坡意识”、促进国家文化认同的契机，将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在华人社会中传递和发扬的同时，迎合国家的需求和华人社会的变化而进行改变和更新，并且将文化传承与促进社会和谐和建立良好的中新关系联系在一起。

（二）以促进华商网络国际化为主要推动力

在全球化浪潮之下，新加坡华族会馆的国际化成为未来趋势之一，而国际化的动力，就在于华商的经济活动和华商网络的建构。“华人经济在殖民地时期已经蓬勃发展，并且随着殖民者的撤退愈加繁荣……东南亚的华人经济领袖既了解现代贸易和生产技术，又熟知本地市场，因此华商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充当西方大型企业和本地经济的中介的方式而使得华人经济走向世界。”[20](P16) 包括华族会馆在内的华人社团与华人经济的联系由来已久。“在创业时期，华人通常得益于他们在各个所到之地建立的宗族会馆和互助协会。这些协会在东南亚和香港地区至今仍然有重要地位……不仅像银行一样可以借贷、提供贸易信息……并且强化和约束了作为大多数华人商业基础的‘口头协议’……如果有人违背协议，整个华族网络会得到消息，他的商途也就结束了”。[21](P141) 如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今，随着东南亚地区政治形势的缓和以及中国经济的逐渐开放，海外华人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海外华人的商业活动与他们跨国的社会联系相一致，构成了一系列遍布全球的、协调的社会经济网络”。[22](P80) 华族会馆要在全球华商网络构建的过程中，走向国际，寻求发展。“华人认为方言、血族关系、共同的宗族起源、相同村落（必要时）或乡村，即使在进行远距离的生意交往时，也能提供一个确定的、基础性的信任。”[23](P24) 因此，华族会馆作为宗族、祖籍和行业的聚集地，自然成为一个传递故土情感并促进海外华人商业联系的平台。“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有接近100次的世界性社团召开联谊会。这些社团包括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各类团体……多数集中在新加坡和香港。”[24](P48) 在这些世界性的联谊会中，商业活动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项目。例如，2012年11月23至25日，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的第七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在新加坡举行，来自世界各地19个国家、50个地区的近4000名福建同乡出席盛会。重头戏是来自世界各地13个福建商团组织签署的友好合作协议书。合作内容包括建立友好商会关系、加强往来、完善合作机制，协助组织企业参与合作方的贸易活动、市场考察、开展多边交流等。[25](P22~27)。因此，新加坡华族会馆借助经济增长形势下华商经济的发展机遇，在故土情感和传统文化的纽带的基础之上发挥华族会馆的商业功能，促进商业交流、巩固和完善华商网络，推进华族会馆的国际化，是华人会馆未来发展的必然路径之一。

（三）以承接新移民为发展方向

随着新加坡现代化建设的进行，政府实施各种政策吸引新移民以满足对人才的需求，维持国家的竞争力。中国新移民在1990年中新建交以后开始大规模流入新加坡，并呈增速加快之势。截至2009年底，中国新移民人数总量约50~60万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10%~12%。[26](P58) 此外，近年来中国对外劳务输出数量整体保持了上升的趋势。[27](P106) 新移民的涌入对宗乡会馆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尽管新移民的数量很可观，“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加入已在新加坡成立的以出身地和宗族为中心的传统的华族会馆组织”，[28](P26) 而是加入了新移民组建的社团。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社团主要有以香港新移民为主要会员的新加坡九龙会、以台湾新移民为主的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和新加坡台湾客属联谊会、以大陆新移民或特定地域为主导的新加坡华源会、新加坡四川天府同乡会，新加坡天津会以及上海交大、北京大学、中科大校友组成的校友会，另外还有留学生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华新社团。[29](P92) 这些社团通过各种活动满足新移民生存与发展各个层面的需要，在帮助新移民融入当地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宗乡团体则依靠其历史文化、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方面的优势，加强与这些活跃的新移民社团的联系，彼此相互促进、谋求发展。在各类重大活动中，新移民社团与宗乡社团的互动已逐步显现。为了促进新移民社团对传统宗乡社团的认识和交流，宗乡总会社会事务组在2011年10月开始举办“会馆走透透”系列活动。2013年4月，福建会馆成为继南安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冈州会馆之后“会馆走透透”系列活动的第四站，也成为了举办至今吸引到最多新移民参加的一次。新加坡福建会馆副会长方百成提出“无论是以前或现在，我们还是希望华族社群能组织起来，互相扶持。”[30](P3) 一位从北京移民到新加坡近20年的新移民在面临难以融入当地文化时提到，“作为新移民，我们应该尽量走出自己的社群，同老移民打成一片。”[31] 因此，宗乡社团作为连接新移民与当地社会的桥梁显得愈加重要。近年来，传统的华族会馆与新移民的互动从未停止。例如，三江会馆自2005年开始联系新移民团体天府同乡会以及宗乡总会等，共同举办“国会议员以及政府民情联络组与新移民交流会”。潮州八邑会馆和晋江会馆分别帮助“新潮留”学生团体和“福建留学生联盟”正式注册并协助举办活动。另外，李氏总会和永定会馆还鼓励新移民成为会馆的领头人并进入领导层。总之，近年来各会纷纷把帮助和吸纳新移民，以及用新移民带动年轻人参与活动作为会馆发展的新工作方向。[32](P5~15) 新加坡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在新加坡福建会馆第40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上提出“吸引高素质外来移民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策略，宗乡会馆可以像帮助早期开埠先贤落户我国那样，协助新一代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33] 华族会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通过与新移民及其社团的交流与合作进行自我更新，加强自身创造力和影响力，并抓住新移民为新加坡华人社团发展带来的机遇，开创传统宗乡社团发展的新局面。

（四）以促进新加坡发展为目的和归宿

华族会馆的兴衰是与华人社会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新加坡当地的变迁和发展又是影响华人社会的最直接因素。因此，华族会馆在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中寻求自身的定位，是未来传统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务之急。早期移居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在他们的观念意识和风俗习惯之中都深深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因素，这是毫无疑问的。”[34](P26) 他们不但保留着庆祝各类中国传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统节日和拜神的习惯，并且衣着、教育方面都展现出中国的气息。因此早期宗亲和宗乡社团的功能是使得身在异国的移民仍能在祖籍地的氛围下生活，维持故土传统和文化习惯，并帮助移民解决困难、提供福利、调节纠纷，显得宗亲色彩浓厚。然而踏入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新加坡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急剧变迁，华人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新加坡华人转变为新加坡国民，"是新加坡华人社会随着新加坡的建国而出现的根本性的变化"。[35](P123) 随着华人加入当地国籍，国民意识逐渐增强，利益也逐渐当地化。自身的生存发展与新加坡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土生华人数量的增长更是增加了华人对新加坡的归属和认同。受华人社会的转变，以及新加坡政府战后政策改变的影响，华族会馆最初产生的历史条件已经淡化，而新的历史使命已然产生，在传承华族文化和促进商业联系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总之，不论是作为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还是作为推动华商网络日趋完善的平台，亦或是发挥促进新移民融入新加坡当地生活的作用，华族会馆必须将自己的发展路程与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建构、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展现以华族会馆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组织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 Joyce Ee. Chinese Migration to Singapore，1896 – 1941 [J].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Vol. 2，No. 1，The Chinese in Malaya，1961.

[2] C. A. Vlieland. the 1947 Census of Malaya [J]. Pacific Affairs，Vol. 22，No. 1，1949.

[3] [新] 苏瑞福(Saw Swee – Hock) 著，薛学了等译. 新加坡人口研究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4] 卢海云，王垠主编. 华人华侨概述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2005.

[5] 梁英明. 战后东南亚华人变化研究 [M]. 北京: 昆仑出版社，2001.

[6] 陈衍德主编. 闽南海外移民与华侨华人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7] 丘立本. 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南亚华人宗乡组织的前途 [J]. 华人华侨历史研究，1996，(2).

[8] 罗英祥. 飘扬过海的客家人 [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

[9] Tan，Thomas Tsu – Wee. Singapore Modernization: A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Social Change [D].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1983.

[10] 黄松赞. 新加坡华人的生存道路 [J]. 东南亚研究，1992，(5).

[11] 崔贵强. 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 ~ 1959(修订卷) [M]. 新加坡: 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

[12] 黄枝连. 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探索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和东南亚的关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3] 李明欢. 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14] 梁英明. 战后东南亚华人变化研究 [M]. 北京: 昆仑出版社，2001.

[15] 孔建勋.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族群态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实证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6] 刘宏. 论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团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社会经济的视野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1).

[17] Sharon A. Carstens.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Society: An Examination of Function and Meaning [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5. Cited from Yow Cheun Hoe. Weakening Ties with the Ancestral Homeland in China: The Cas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Singapo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J]. Modern Asian Studies，Vol. 39，No. 3，2005，pp. 559 – 597.

[18] 曾玲. 调整与转型: 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变迁 [J]. 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5，(1).

[19] 张燕萍. 百年老店的年轻引航者——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年活动回顾与展望 [J]. (新加坡) 源，2005，(4).

[20] Ruth McVey. The Materialization of the Southeast Asian Entrepreneur [A]. in Ruth McVey (ed.).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s [C].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n Program，1992.

[21] Andrew Tanzer. The Bamboo Network [J]. Forbes，July 18，1994.

[22] Darryl Crawford. Chinese Capitalism: Culture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and Economic Globalisation [J].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 21，No. 1，2000.

[23] Andrew Tanzer. The Overseas Chinese: A driving Force [J]. Economist，July 18，1992.

[24] 刘宏. 海外华人社团的国际化: 动力·作用·前景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1).

[25] 严孟达. 形势大好宗乡社团不寂寞 [J]. 源，2012，(6).

[26] 谢美华. 近20年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及其数量估算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3).

[27] 王辉耀，刘国福.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8] [日] 小木裕文. 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 [J]. 南洋资料译丛，2001，(1).

[29] 王望波，庄国土编著. 2009年海外华侨华人概述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30] 架桥梁，促融合——新移民参观福建会馆与天福宫 [J]. [新加坡] 传灯，2013，总第57期.

[31] 王健. 现阶段谈"融入"为时尚早 [N]. 联合早报，2009 – 04 – 11.

[32] 吴红勤等. 新老移民一家亲——老会馆与新移民 [J]. 源，2009，(4).

[33] 谢燕燕. 副总理黄根成: 宗乡会馆可助新移民融入社会 [N]. [新加坡] 联合早报，2010 – 08 – 08.

[34] 李路曲. 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6.

[35] 黄松赞. 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变化略述 [J]. 东南亚研究，1987，第(1)，(2).

[责任编辑: 胡潇文]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nance and influence of Ming Empire to Burma decreased compared to Yuan Empire, Nevertheless the trade between Ming Empire and Burma grew to some extent, and Chinese immigrants in Burma boomed, whose native place and vocation were diversified. The establishment of Great Ming Street shows that Chinese immigrants in Burma had established their own residence and their own commercial network.

Key Words: Ming Dynasty; Sino – Burma relations; Chinese in Burma

(12) **Indian Scholars´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Yin Xinan* • 79 •

Abstract: With traditional and foreign scholarly methodologies, Indian scholars in the 20th century have undertaken enough fruitful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of which the histories of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ndian literary criticism are naturally integral parts. What Indian scholars have gained could well be said to have set an example for Chinese counterparts.

Key Words: Indian literature;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 Indian literary criticism

(13) **Reasons on the Problems of Rohingyas in Myanmar** *Guo Qiumei and Lu Yong* • 86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ohingya people have sailed away from Myanmar, which regarded as a new era of 'boat people'. Why they are living away from their homes as 'boat people´ On the one hand,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from different religions between Rohingya and ethnic Rakhine who also reside in Myanmar Rakhine in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Burmese government didn´t give them citizenship. After a new government in Myanmar came into power in 2011,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clusive government become the new government´s reform goals. Rohingya problems would be resolved eventually and effectively, which become an important challenge to the new government of Myanmar.

Key Words: Myanmar; Rohingya; Ethnic group; Religion; Citizenship

(14) **The Incorporation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into MCA** *Yuan Jingjing* • 91 •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MCA) on behalf of government had implemented state corporatism over Chinese community by means of intervention, induction and repression especially when there were leadership changes in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From 1995 to 2004, the Chinese organizations were depoliticized and lost strong leadership, which led to the success of MCA i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However, due to lack of legitimacy, the incorporation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failed the progress of the Malaysian civil society.

Key Words: Malaysia;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MCA) ;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Incorporation

(15) **The Evolution and Status Quo of Singapore´s National Identity under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take Lianhe Zaobao as a Case** *Zhao Siyang* • 96 •

Abstract: The force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orming and chang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Singapore, it also account for a "conflict – response" model in Singapore´s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factors of geopolitics to economic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has been constantly shaping the type of Singapore´s national identity. A lot of reports of Lianhe Zaobao shows that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mpacts the national identity recent year.

Key Words: Nation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society; System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Lianhe Zaobao

(16) **The Transition, Caus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after World War Ⅱ** *Li Jinping* • 102 •

Abstract: Chinese associations which have a history of hundreds years in Singapore went through a series of changes after World War II, including the short – term recovery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the depression after Singapore independence and the renaissance since 1980s.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of the changes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international factor, national factor and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in order to create a new situation, Singapore Chinese association should be Singapore – oriented, take the inheritance and sprea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s foundation and take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new immigrants from China as direction and gradually to be internalize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hinese association; Transition; causes; Immigrant; Future development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